

鲁迅研究丛书

关于 “人”的审视 和建构

——鲁迅与世界文学的
一个重要视角

许怀中
著

鲁迅研究丛书

关于人的审视和建构

——鲁迅与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

许怀中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鲁迅研究丛书

关于“人”的审视和建构

——鲁迅与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

许怀中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插图 237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24-01513-X/I·329

定价：5.95元

序 论

鲁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大凡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无不以极其丰富的人类文化思想为自己的精神养料。特别是时代的巨轮驶出中世纪港湾之后，卓越伟大的思想界、文艺界人物，往往从整个世界文化思想领域，吸取各民族的思想营养。主要的原因是：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产生，都带着世界性的标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接着，他们对于精神生产的现象，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共产党宣言》）

人类文学思想观念中的“世界文学”，一直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年代。但文学真正成为世界性，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近代资产阶级是开辟世界市场后形成的。19世纪上半叶，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的交流，这一壮观的历史进程中，导致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诞生，这是人类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通常被认为是歌德在与爱克曼的一次谈话时提出的，这次谈话的时间是在：1827年1月31日。话题是从他阅读中国一部传奇给他留下的印象谈起的，这作品使他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

的共同财产。”歌德说：“民族文学在现代并不是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产生，是他对于东西方文学的综合审视的结果。它预示了人类文学交流、融合的基本方向，以及世界文学发展的途径和趋向，标志着人类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

过了2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文学”的命题。马、恩比歌德思想进了一大步，因为歌德是发现一体化世界文学实现的可能性，而马、恩则是看到了这种世界文学形成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中国近代史，是“世界文学”意识的初步觉醒的历史阶段，直到五四前后，这种意识不仅存在于鲁迅的观念之中，而且普遍地掌握了许多作家、艺术家。五四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具有开放意识、自由意识的时代。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无不把自己置身于世界文学的潮流中，更新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批评原则，寻求新的艺术风格，新的美学理想。而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却是一个现代作家当代意识的标志。现代作家成长的过程，是破除小生产者狭隘、落后心理、开拓视野的过程，是和因循守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决裂的过程。

随着历史的进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科学论断，不断得到证明。就以近现代不断涌现的文学家而言，他们不仅得到本民族思想文化遗产的孕育，同时也受到其他民族以及世界思想文化的厚赐。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卓绝的贡献，突出体现在他反映

（1）《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3页。

了中国人民从近代向现代历史过渡以及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之后，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自觉意识，透射出中国人民在世界文化潮流中为实现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在中华民族的这个现代自觉的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都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到鲁迅，才发出中华民族真正自觉之心声。

鲁迅可以说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汇流中孕育出来的巨人。鲁迅从幼年开始，就垒起祖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随着岁月的增长，他对我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研究，造诣越来越深。他和外国文化，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南京求学时期，便对赫胥黎的《天演论》产生了浓烈的兴趣。鲁迅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别求新声于异域，系统地接受外国文艺思潮的熏陶，特别是富有民主精神的拜伦等“摩罗派”，更使鲁迅感奋，他介绍“摩罗派”到中国，冀求以“摩罗派”的革命精神，振奋人们的精神境界。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总结文化历史的经验，主张从世界史上，汲取新的东西，增长人们世界的见识，发扬民族精神。从五四运动前后，一直到晚年，鲁迅始终不渝地翻译介绍、研究外国文学。

20年代中叶，鲁迅痛感不吸收外国文艺思潮，将使人们眼界狭小，“排斥异流，拾土国粹，哪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他要求大家做培养天才的土壤，这便是“容纳新潮，脱离旧套。”^①鲁迅回顾我国历史，提倡我国历史上的“汉唐气魄”，即敢于对外开放，吸取外来文化艺术长处的创造精神。鲁迅把敢不敢吸收外来的东西，作为一个民

① 《致·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278页（人民文学1957年版）。

族兴衰的标志。他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每当一个民族强大的时候，它是敢于而且善于吸取外国文艺遗产的；只有当它处于没落、腐朽时，才害怕外来的东西，而陷入盲目排外的窘境。鲁迅从古铜镜的装饰，想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伴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正如肠胃健康的人，就不忌食一样。那枚古铜镜的装饰，便是融合外国花纹、图案等艺术的见证。而当一个民族窘弊陵夷的时候，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于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这就是衰弱的症候：总想到害胃、伤身，持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¹⁾。鲁迅的这种深刻的见解，现在还焕发着灿烂的思想光芒。

20年代末，鲁迅面对当局的封锁政策，大声疾呼：“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鲁迅同时揭示：外国的新文艺思潮，谁也阻挡不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他说：“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²⁾参加世界文艺事业和了解世界文艺潮流，是完全一致的。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强调要注意世界的时代思潮，还从理论上概括文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他说：陶元庆的绘画，“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枯亡中国的民族

(1) 《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页（第1卷引文，均为1957年版）。

(2) 《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第549页，人民文学1982年版。（以下未注明版本者，均为此版）。

性。^①

到了30年代中期，外国文艺思潮和创作的介绍工作濒于停滞。这固然是反动当局的禁锢政策造成，但也由于传统势力太顽固。鲁迅写了《由聋而哑》，文中转引了勃兰克斯感叹丹麦文学衰微的一段话：“文学是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聋’，那结果，也就招致了‘哑’来了。”

（《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第一卷自序）鲁迅慨叹道：“这几句话，也可以移来批评中国的文艺界。”鲁迅这篇文章，发展了20年代提出要做“泥土”的精神。他认为缺乏介绍外国思潮的“土壤”，只能产生尼采所说的“末人”。他呼吁：“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②

鲁迅思想深刻之处，在于他把“介绍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称为“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他有感于当时这条航路被聋哑的创造者们堵塞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写了《拿来主义》。鲁迅发出震聋发聩的声音：“我们要拿来。……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是鲁迅总结汉唐以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我国与外国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而提出的，也是他一生对于外国思想文化和民族文化遗产经验的总结。鲁迅自己的实践，便是“拿来主义”。

（1）《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第550页，人民文学1982年版。

（2）《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

最好的典范。鲁迅不仅在早期，而且在前期、后期，在介绍国外文艺思潮、翻译世界名著，打开运输精神食粮的航路方面，真是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介绍日本的、东方的、欧美的、俄国的、被压迫民族的、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各种文艺思潮流派和优秀作品，这些浩繁的翻译和评介外国作品和理论的著作，似乎占了他全部著作的半数。他自己的作品，便是基于社会现实生活，汲取中外古今文化的精华熔铸而成的珍品。正因为这样，鲁迅跨进了世界文学之林。这是中国的骄傲，在建设新文学，革命文学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的文学活动》）

综上所述，鲁迅的实践和理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条脉络：鲁迅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从世界文化中汲取养料，其目的是改变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而造成的封闭、静止、凝固的心态，鲁迅竭力帮助人们走出自己设计的那个狭小、陈旧的心理藩篱。

鲁迅深感，要建构中国人的心灵，必须面向世界，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是面向世界的目标、方向和任务，它是面向世界，围绕于变革和震动中国现实社会的总目标。面向世界，可以打破闭关锁国的格局，扫除民族的狭隘主义的偏狭，能够广泛吸收各国长处和经验，对社会、人民都有利。就以文艺范围来看，面向世界，也是振兴文艺事业的法宝。鲁迅一再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的偏狭，又防止盲目崇洋媚外的片面性。面向世界，不单纯只是介绍、照搬世界上各种外国的文艺思潮流派，而必须联系国情，考虑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而加以抉择。正如鲁迅所说的：和世界潮流合流，“而又并未枯亡中国的民族性”。汲取外国先进思想文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一致的。

基于此，鲁迅一再强调中国文艺要打到世界去，必须有自己浓厚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但是，这和面向世界是并行不悖的。

然而，在鲁迅所处的黑暗时代，要真正做好“拿来主义”是不可能的，要体现鲁迅所希望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精神，也是难以做到的。历史证明：只有独立自主，坚持开放，才能真正拿来；只有具备胆略、气魄和自信，才能敢于拿来；只有运用辨别力放出眼光，才能善于拿来。而这些，也都是立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面向世界所必不可少的要求。

可喜的是，现在我们的时代完全具备了上述的条件，坚持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我党不可动摇的国策。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以近现代的历史为经验，对鲁迅的“拿来主义”，和他的立足中国，实现为了建构民魂和人的心灵，而面向世界的精神进行再认识，这不能不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课题。

鲁迅和世界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课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本书只能从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并找出一个贯穿性的思想轴心：从他开始介绍“摩罗派”的“为‘立人’”作为第一时期；五四前后受俄罗斯“为人生派”影响，“为‘救人’”作为第二时期；20年代末叶到30年代中期介绍外国文学，“为‘新人’”作为一条贯穿的线索，贯串在全书的脉络之中。

关于“人”的思考和建构，是鲁迅和世界文学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这是本书所要阐明的命题。它表明：鲁迅的“立人”，是他的思想出发点；“救人”是“立人”思想的深化，只有把“人”的精神痼疾治好，才能“立”起来；“新人”是“立人”的归宿，是对于要“立”的什么“人”，怎样“立”

起来的问题，找到了明确的答案。“立人”、“救人”、“新人”标明了鲁迅关于“人”的思索和审视的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但都贯穿着“人”的探索和建构的中心，而且围绕着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反思，借助外国的思想文化的资料来完成这项伟大的思想文化工程。

“立人”是鲁迅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思想发展的基础。在这一阶段，鲁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立人”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先立人，才能立国。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呐喊》、《彷徨》等小说和《热风》、《华盖集》等杂文之中。在这一阶段，鲁迅还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呼吁社会关注儿童的命运。这一思想在《狂人日记》、《华盖集》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救人”是鲁迅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鲁迅开始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命运，特别是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他通过《彷徨》中的《阿Q正传》、《药》等小说，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杂文，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在这一阶段，鲁迅还提出了“立人”与“救人”相结合的思想，认为只有先立人，才能救人。

“新人”是鲁迅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鲁迅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他通过《呐喊》中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杂文，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旧思想的腐朽。在这一阶段，鲁迅还提出了“立人”与“新人”相结合的思想，认为只有先立人，才能建立新人。

(031)	……章士钊《海宁》诗序——《海宁	
	附录》及其《草律》诗《海宁诗序》	三
(82)	……	
	目 录	
	……	

序 论	(1)
第一篇 为“立人”——向“摩罗派”汲取，建构以	
(701) “立人”为中心的思维	(1)
一 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反传统精神的孕育	(1)
(701) 二 “立人”的思想准备——“进化论”	(7)
(132) 三 科学和文学的渗透——“导中国人群”	(16)
(132) 四 民族群体意识的觉醒——“斯巴达之	
(132) 魂”	(22)
五 文艺“新生”运动与“摩罗派”：“立	
(102) 人”思想的体现——“重个人”的提	
(132) 出	(30)
(132) 六 “异域文术新宗”的引入——转移性	
	情，改造社会 (57)
第二篇 为“救人”——以俄国“为人生派”为借	
	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催人留
	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64)
一 从为“立人”到为“救人”	(64)
二 挖掘人的灵魂之深：从《呐喊》到《彷徨	

	惶》——引起“疗救”的注意·····	(120)
三	《苦闷的象征》和《野草》及其“象征性”——深层意识的剖析·····	(156)
四	杂文中的民族共同反思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171)
第三篇	为“新人”——广泛“拿来”；没有“拿来”就没有“新人”、“新文艺”·····	(197)
一	打通“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道”；广泛“拿来”——为培育“新人”引进世界文化思想资料和信息·····	(197)
二	实现从为“立人”、“救人”到为“新”“新人”的历史性伟大转变·····	(221)
三	视线新转移，视野更开阔·····	(227)
四	开拓思维空间，提高民族意识，创造民族新文化·····	(283)
结语：	引进外国文学和发展民族文学的双向对流——“新人”建构工程的集体效应·····	(309)
后记	·····	(327)
附记	·····	(329)

第一篇 为“立人”——向“摩罗派”汲取建构以“立人”为中心的思维篇

一 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反传统精神的孕育

作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走向西方寻找新知，在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广泛联系中，开拓我国新文学的道路，昂首阔步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文学家鲁迅，他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一个从小康家庭坠入困顿的巨变，使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态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他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古老的封建文化的积累，形成了世界所罕见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这种罕见的文化现象，是由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及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这种文化思想，既是封闭的，又是具有很强适应能力的文化传统。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巴比伦等，它们的文化衰落了，渐渐丧失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唯独中国文化不然。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首先提出世界文化史的一个现象：“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未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肖条而止。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

最有力莫如心声。”⁽¹⁾人们随着时代的推移往下读，直到最后一页，感到凄凉。人类流传到后代的文化，最有力量的要算是语言文学，而诗歌是文化史兴衰的标志，只要诗歌衰弱了，文化的光辉也随之消失。鲁迅举了印度、希伯来、埃及、伊朗为例说明这个文化现象，这些文明古国的文化都衰落了，而中华民族的文化永远保留在世界文化史上。这是好事，因为它有着强大的同化力，而当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把它们变了样，即所谓“移步变形”，由于如此，这种文化传统有着顽强的惰性。中国的固有文明，在近代蒸蒸日上的现代文化中，越来越显出自己的龙钟老态来，其中虽有极其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它背上的历史包袱实在太沉重了。

幼年的鲁迅在私塾里熟读了《鉴略》及四书五经之类历史典籍，少年时代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野史杂记，国学根柢很深，深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从《山海经》之类的书籍，得到启蒙。他那幼小的心灵种下了山川河海知识的幼苗，又培养了最初想象的翅膀。更重要的是，刑天舞干戚的故事，在鲁迅的心田埋下了不屈不挠地顽强反抗的火苗。当鲁迅从阿长手里接过《山海经》时：“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²⁾

(1) 《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

(2) 《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第247—248页。

另一方面，《二十四孝图》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糟粕，使从小就养成思考习惯的鲁迅，从直觉中感觉到封建思想文化糟粕的荒谬性与可笑性。《二十四孝图》曾经在鲁迅幼稚的心灵，荡起了骚动、不安、怀疑以及反感的漪涟。鲁迅从一位长辈那里得到一本《二十四孝图》，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其中如“哭竹生笋”使他可疑；“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最使鲁迅反感。前者装佯，令人感到肉麻；“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后者简直使人恐慌。“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亲愁穷，怕看见我的自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¹⁾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糟粕的反面教员，产生了鲁迅反传统的情绪和思想基因。

时代的风雨，民族的苦难，家庭的中落，世态的炎凉，使鲁迅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和世俗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拒绝了科举应试之途，到南京寻找新的出路。从水师到矿路学堂，都无法满足鲁迅对新知的渴求。“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²⁾。青年的鲁迅，作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走上了到西方寻找新知识、新文化，寻找真理的知识分子的行列了。

(1)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第253—256页。

(2) 《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297页。

我们还可以稍稍把思绪拉到远古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形成各种思想文化流派的时代，孔子、老子和墨子等，是儒、道、墨学说的奠基者，此后，他们的门徒弟子和信徒们以及从事注释的学者，长年累月地、一代一代地加以补充、修改，按照时代和个人的需要和理解，不断参与这种种学说的建构。

为了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有必要从它的信息源上，和西方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尽管和西方文化的信息源——古希腊文化，有表面上类似之处，正如上述，春秋战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就其整体性的特征上看，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和古希腊分散自立的城邦国相似，但这不过是形式上的相似，而实质上毫不相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由一个统一的周王朝分裂而成，大统一观念，还牢牢地拴在诸侯国的心目中。而古希腊的各个城邦国，是分立的，未经过“大统一”的“训练”的，所以在观念上也是分立的。前者是表面上的平等自由，而实际上是不平等，不自由的，弱的诸侯国对强的诸侯国的附庸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后者从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上，城邦之间是平等自由的。因此，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平等自由，便带上了“求同”的色彩。在这种历史格局下的各种学说的代表人物，其价值观念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孔子一生在游说中度过，他的自身的价值只有转化为政治的价值，才能存在，他自身丧失了主体意识和个性。因而他的伦理学只有在政治学中取得自身的价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不是这样，他可以从哲学、伦理学中，获得人的首肯，影响别人，自由地表现个性，他的学说固然也有实用的价值，但是更主要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智